《铁蹄》中的二元视角*

[美]约翰·沃伦-布里奇　高学栋 译

伦敦的政治信仰,在其一生中无论是否有过动摇,都不能与他对写作的热忱同日而语,特别从其对于政治小说的写作来看更是如此。[1]在如不能说,写作政治小说时他是过度热忱,也该说是相当热忱。虽然《铁蹄》是一部政治小说,虽然它偶尔也有说教,但是仍不失为一部含幽默之作,带有它的喜剧性的—以实玛利的方向。首先,伦敦不是一位幽默家,他通常把他 1908 年反乌托邦的幻想小说说成"宣传"。他那些阅读社会主义月刊《威尔夏杂志》的崇拜者们,并不因此而减轻对他小说的重视;可是对于文学批评者来说,"宣传"通常是个贬义词,它一般指次等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来源于把艺术与政治信仰混为一谈的结果。因此我们总认为,政治小说家缺乏幽默感,思维单一。一位作者一旦获得政治小说家的名声,那么他其他方面的天赋就没有被人赏识的希望了。为了避免这种偏见,作家要竭力表现出一种幽默感。在伦敦的长篇小说里,有两个主要的幽默来源:其一是直接与主题相关的幽默;其二是源于二元视角的幽默。

《铁蹄》的时事性既与它写作的时代有关,也与我们的时代有关。这两个方面合而为一,体现于以下这个问题中:伦敦第一批读者是否把这部小说看成是对未来恐怖的预言;或者他们是否看得出小说把他们自己那个历史时期戏剧化了。当今世界"预言"之风尚方兴未艾。所以,人们要问,用我们现代的方法标出此书的特性,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是熟悉的,抑或是陌生的?一位 1908 年的书评作者认为,"预言"和"被发现的手稿"之类惯 用手法是平庸之举;可正是这些惯用手法却使得近来的几部小说为人颂扬,象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侍女的故事》。因此,20 世纪后期的预言风尚使我们不能像当时的读者那样来看待这部小说。

把反乌托邦文学作为政治预言来阅读的偏好分散了对作者的政治讽刺的注意。不管《铁蹄》预言什么,它在厄内斯特·艾吾哈德偏执的争辩中与不偏袒一方的脚注中都把与主题相关的幽默(比如,过时的州与州之间争强好胜的打趣)与政治讽刺结合起来了。当厄内斯特·艾吾哈德对那些象密苏里佬的学究们宣称,他自己象得克萨斯佬——"你不得不把它放在我的手里"的时候,厄内斯特的幽默,虽是表达他固执的怀疑主义和绝对的唯物主义,却可以被理解为它在表达社会主义的见解。[4]我们只有在理解了厄内斯特·艾吾哈德是具有美国侃大山人物的一些特征:夸张,地域自豪感和地方性竞争意识,才能理解密苏里或得克萨斯的笑话。这个幽默可以政治化,但在这里,伦敦使传统的美国幽默与明显的社会主义幽默混然一体了。

在小说的结尾,芝加哥公社的失败也许是向这部政治小说的读者所能表现的、最具有预

---

* 1996 年是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1876–1916)诞生 120 周年、逝世 80 周年,许多国家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对这位作家的纪念。晚近,国内外对杰克·伦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约请北京大学英语系李淑言教授组织编辑了以下几篇文章,以期从不同侧面反映上述研究动态。在此谨向李淑言教授致谢。——编者注

言性的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四]但即便是恐怖景象的描述也不时穿插一些紧扣主题的幽默,其作用是产生喜剧性,以缓解恐怖的气氛。比如,有一则针对工业化生活之残酷的社会主义笑话,由安东尼·梅瑞狄斯以脚注的形式概述如下:

> 芝加哥是公元19世纪的工业地狱。有一则关于约翰·彭斯奇特的轶闻一直流传到今天。他是一位英国著名的劳工领袖,而且,曾当过英国内阁成员。当他访问美国到了芝加哥时,他被一家报纸的记者问及对芝加哥的印象。他回答道:"芝加哥是地狱的缩影"。过了一些时候,当他登上汽轮要回国时,又一名记者走近他询问道,他是否已改变了对芝加哥的印象,他说,"是的,我已改变。现在我认为,地狱是芝加哥的缩影。"

在上述引语中,熟悉的幽默与具有明显政治观点的幽默之间的关系更近了。通过这个幽默,伦敦打消了这样的提法,即政治精明与普通人的欣赏之间有天壤之别。

不管约翰·彭斯的轶闻是否是读者的日常闲谈,但伦敦喜欢它,证据之一是,在他对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评论中曾用过这一轶闻。这一冗长的脚注,实际上,是从1906年书评的开头几乎一字不差地抄袭过来的。伦敦也曾在这篇书评和他这本小说中使用另一引语,即丁尼生的以"地球这个舞台"[五]开头的四行诗。这些相同之处,加上伦敦对《屠场》的肯定性反应,表明伦敦在写作《铁蹄》时,把那个时期的芝加哥牢记在心头。他对于辛克莱小说的评论就预示他自己小说即将诞生:

> [辛克莱]选择了这个国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它是这个国家中工业上最成熟的城市,是现存的弱内强食文明最完美的标本。没有人会怀疑作者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芝加哥确实是工业化的典型,是资本与劳工冲突风暴的中心,一个充满巷战与流血的城市……

我们不能确定,此篇书评是否是小说《铁蹄》芝加哥章的梗概,或者,当他坐下来褒扬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时,他自己的小说轮廓已遥遥在望。但我们能确定伦敦在极大程度上希望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向本世纪头十年工业化所造成的残酷后果上。伦敦的书评以及手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约翰·彭斯的趣闻也可以予以相同的解释。

今天,许多读者不愿意正视《铁蹄》揭发的内幕性质,这一点不可思议,因为那些内幕揭发者令实行铁路独裁的政治寡头们极端恼怒。比如,H·布鲁斯·弗兰克林在为该书1980年版(此版的配图为一只铁蹄在践踏被推翻的智利社会主义者阿连德的脸)作序时指出,伦敦具有惊人的预见力。这种观点,在被毫无保留地提出时,使我们离开,而不是朝向,伦敦努力要再现的政治实情。

> 伦敦预见到:随着为工人阶级中可说是特权阶层建造的诱人郊区住宅的增多,市中心区会变成他所称的失业群众和下层劳动者栖身的"贫民窟",他们被推进最黑暗的深渊;在经济上蓄意破坏公共教育,以扩散文盲与无知;越来越多的人承受不了食品、医疗、住房等高昂的价格……

弗兰克林提供了比上述所引的小事例多得多的证据,而且他的推理令人信服。《铁蹄》迫使我们作出了这样的比较。弗兰克林也力图证明,伦敦能够提出这样令人惊讶的预见,是因为他本人丰富的经历:"伦敦怎么会对未来作出如此惊人的预见呢?我相信,答案在于他亲自体验过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的相互矛盾的经历"。虽然关于他的丰富多彩的经历如何影响《铁蹄》,富兰克林说得很少,但是他把此小说看作是预言这一点有时是靠仔细阅读得来的。

> 这部小说当然是对伦敦的美国社会主义同志们的一个警告:完全指望投票箱打败资本主义者的策略是危险的幻想。但是,艾瓦哈德以暗喻的

超级男子主义作派与资本家对抗的方式证明同样是危险的。随着《铁蹄》对自己影响力的巩固，革命者被迫依靠错综复杂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是由取名恰当的娘家姓克尼汉姆氏的阿维丝（"鸟"）[原文如此]·艾吾哈德发展起来的。（V）

对上述解释，人们很少产生歧议，也许除了过分的认真以外，这种过分的认真甚至保持到弗兰克林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阿维丝·艾吾哈德这个人物以后。在这里反讥和条件全被忽略了。

虽然有政治信仰的批评者们有时同情伦敦的动机，欣赏他的成就，但他们就不会同意他的政治预见如他们不愿意认同贯穿于《铁蹄》始终的，有关主题的政治幽默，当伦敦抱怨其小说遭遇到来自左派大多数批评者的敌意反应时，他可能指的就是僵化的社会主义者对文学的态度。伦敦于1914年10月26日感谢"哈里森同志"对《铁蹄》的欣赏，同时，抱怨说，《铁蹄》使得[他]实际上只获得了机会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者的毁谤。很明显，哈里森曾要求伦敦再写一个续集，因为伦敦继续写道：

> 不要建议我再写一部这类的书。那是一种爱的劳作，而作一部书，那是绝对的失败。购书人群不愿问津，而我一无所获，得到的只有社会主义者们的冷潮热讽。

通览伦敦本人的速写笔记，可以看到，这是左派方面绝无仅有的一位评论者，他愿意容忍伦敦对教条社会主义所做的变奏。

现代主义政治小说，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小说，大都起源于《铁蹄》的二元视角。二元视角兼容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些不确定性构成当代小说得以繁荣的基础；而且这种一分为二的视角也解决了政治小说作为一种特殊体裁所固有的一系列问题。[½] 最重要的是，二元视角娱乐读者，比如，当伦敦在阿维丝的叙述与安东尼·梅瑞狄斯的历史脚注之间创造出喜剧张力以讥讽缺乏思考的态度时，他使日常语言起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学究们"一章，第一号政治寡头，维契森先生嘲笑厄内斯特一次关于无产阶级之高贵的讲演，讽刺他为"乌托邦者"。以下脚注为这个词提出一个关于乌托邦的另解以替代那代人关于"乌托邦"的认识：

> 那个时代的人是词语的奴隶。他们自卑的奴性是我们不可理解的。词语中的魔力胜过魔术师的法术。因此，他们头脑混沌又混乱；一个词的说出可能否定[原文有误]一生严谨的研究和思考所得到的归纳概括。这样一个词就是形容词"乌托邦的"。只要说出这个词就可能毁掉任何无论经过怎样深思熟虑作出的经济改良或恢复改造计划。广大的人群会因为听到诸如"一个诚实的美元"和"一只盛满晚饭的桶"之类的词语而欣喜若狂。创造此类词语被认为是天才之作。

上述这段文字，在虚情假意地称赞这类的天才之作的同时也显示出它是乔治·奥威尔双重思想的隔代始祖。

脚注在使我们微笑之时，也讥讽了那种缺乏评判力的态度。在这一态度之下，政治语言中的陈词老调和生活中的老生常谈有了交通信号般的威力，比如，人们不怀疑"桥已断"这个信号的意思。伦敦利用二元视角提供的讥讽机会，给予读者一种幽默选择，用以替代那种缺乏思考的语言；那种语言授予"乌托邦的"这类词以思想意识上停行的信号权力。伦敦力劝我们用怀疑主义态度对待政治语言。

绅士阶层特有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禁忌并不禁止小说作者谈论政治和宗教，而当然这些是小说家经常的话题。然而，与其说存有涉及主题的禁忌，倒不如说有修辞上的禁忌。要当一名说教者或一位政治家，就要冒失去作为文学艺术家地位的危险。我们都被告之，作家千万不要说教，他或者她如果这样做了，就一定是二流艺术家。"对皈依者说教"是只说那些听者不会对其内容有任何争议的话。它是从一个完全一致的

视角讲话的。巴赫金把绝对权威的主张称为“独立”话语。“说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自己俨然以牧羊者身份自居，站立在一群徘徊的羊前面；这个形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不令人愉快。文学法庭与政治法庭要求的举证责任不同，所以一部长篇小说使一陪审团满意，却也许永远不会被提交给另一陪审团。许多政治小说在艺术上失败是因为他们说教，这是事实，但这并不就会使政治小说体裁脱离于其他文学类别，真正的艺术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总能化险为夷，取得成功。政治小说首要的风险，而且也是对自身小说形式具有最深刻意义的风险，就是，从修辞上说，它必须是很有冲劲儿的。如果确是政治小说，它把读者推往其可能不情愿的方向。然而，文学特征就没这种推进性。更多的是劝说和暗示。《铁蹄》在这方面只取得部分成功，但是它是正面接触政治问题的；由于运用二元视角的艺术手法，它防止了把政治艺术降低为政治宣传。

《铁蹄》运用“被发现手稿”的虚构开展二元视角。第一视角，即阿维丝·艾吾哈德视角，是英雄式的视角。阿维丝报告自己的经历，但她主要讲述的是她的丈夫厄内斯特·艾吾哈德的历史。我们从前言与历史的脚注中得知，阿维丝的叙述，恰在第二次起义爆发前夕被打断。第二视角，即历史学家，安东尼·梅瑞狄斯的矫正视角，展现阿维丝·艾吾哈德叙述的缺点，那就是美化自己的丈夫。梅瑞狄斯显示了一比较全面的，个人行为贯穿其中的历史情节。

政治与文学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同样，小说中的二元视角也不时互相抵牾，向我们展示了从内斜视见到的美国政治命运。此二元视角是与内容相关联的，带来一系列幽默的，和在政治上发人深思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用这种方法把个人的和英雄视角与集体的和决定论的视角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使得伦敦找到一种方法把政治哲学内在的影响戏剧化。在这方面幽默不是使政治小说能令读者欢迎的补充，而是非极权化政治小说的形式特点。作者的机智（借用艾略特的定义）承认了其他种类的经历是可能的。现代主义政治小说作者由于不承认这一点因而处境尴尬。

《铁蹄》的文学力量主要起源于伦敦二元视角的运用。这些视角之间的紧张关系再现个人在反抗极权主义压迫中必须遭遇到的冲突。无论我们说的是维希法国时期对纳粹的反抗，抑或是小说中对极权统治的反抗，反抗的成功既需要个人的牺牲也需要集体的行动。“个人牺牲”以英雄主义或英雄式的献身为先决条件；而“集体行动”取决于压制个人的观点。两种方式都有必要，但是这些思想一旦直接接触就互相磨擦。由于存在这些困难，政治家和作家必须将互相对立的势力纳入一个有序的混和体，一种不和谐的和谐。政治作家必须这样做，即使在对近期前景做出启示录性质的描述时也不例外。

二元视角能使为政治对抗所具有的，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赖的模式共存；其共存的方式也不妨碍读者的兴趣。读者会马上看出，寡头政治不是单个英雄人物所能对付的历史实体，但他们会认同英雄人物的反抗精神。如果读者能这样理解“英雄主义”的组织上的虚构，他们既不必低估初期极权主义的力量，也不必对陷入这一制度中的个人相对无能为力而绝望。由于同寡头政治的对抗，必须从几代人的和个人的斗争两个方面来衡量，由于读者倾向于从人类生活范围内看待小说，因而伦敦运用二元视角以便在修辞上看，是让人在无能为力的两极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虽然《铁蹄》的读者一定会偶尔遭遇关于本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单调的说教，但是伦敦在其小说中自始至终诙谐地使用二元视角，展开以各种方式进行政治对抗的难题。他在形式上的设计与风格上的选择相得益彰；在诸多方面经得起考验和权衡。

例如，如果我们不是从极力轻视作者所用的结构的重要性方面来看待这部小说，那么一些批评家认为是缺陷的东西就可显示出其为伦敦设计中的有用成分。

评论家厄尔·拉博尔对小说是以阿维丝·艾吾哈德开头的风格表示不满。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艾吾哈德的手稿用这样多情的句式开

头: "夏日温柔之风"而同时 "激流荡起涟漪,抛撒在布满苔藓的石头上"?伦敦不只是为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分子写作,所以他采用二元视角把女性印象与男性印象结合起来。即然阿维丝的印象一点都不能引起安东尼·梅瑞狄斯的兴趣,她的多情就被这位历史学家的情感框架住了。安东尼·梅瑞狄斯的小说前言和脚注指明了阿维丝·艾吾哈德视角之错误,而她的视角几乎从没有明显地损毁梅瑞狄斯大男子主义之自负。这对于今天政治上正确的读者来说,是个困境:是自鸣得意地断定伦敦有性别歧视之嫌,从而否定下列事实,即伦敦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性平等的进步人士(性别平等为我们时代的风尚,现代人在道德上似乎比作者高过一筹),或者探索,阿维丝是否在任何方面损毁了安东尼·梅瑞狄斯。读者当然有最后的决定权,但是从字面上看,伦敦向我们表现的阿维丝·艾吾哈德的观点比任何其他人物的都多。尽管这位历史学家的聪明才智来源于晚生了七个世纪,但事实上,阿维丝·艾吾哈德的叙述没有被历史学家之傲慢所扼杀,。虽然这叙述没有超出文化框框,而这文化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已被看出是压迫妇女。但我们必须记住,伦敦所进行的不是今天的战斗。正如弗兰克林提醒我们的那样,伦敦写作于妇女获得投票权之前,竟能构想一个未来,到那时,相当数量的妇女会在反抗绝对父权制寡头政治中起关键作用。

正如《格利佛游记》开头所声明的,故事内容纯属虚构,《铁蹄》开头是一位历史学家证明,本手稿无关紧要。历史学家前言之首句是:"艾吾哈德手稿不能说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此时,读者充分意识到,这句话并不表明,它要读者放弃 354 页的正文,即阿维丝·艾吾哈德在小说《铁蹄》所占的部分。总处于历史学家与参与者中间地带的读者对这种不和谐应该发现会心的微笑。

第一个脚注出现在阿维丝·艾吾哈德篇的第一自然段的结尾。她进行动情地申辩"它[即起义]也许不是不成熟!"随后脚注迅速把读者转向一个知识分子的分析的竞域,与阿维丝亲自经历形成鲜明对比,梅瑞狄斯对艾吾哈德的申辩以明智而冷淡的散文作了如下的评注:

> 第二次起义主要是厄内斯特·艾吾哈德的功绩,当然,尽管他也是一位合作者,与欧洲领袖们一起。艾吾哈德的被捕和被秘密处决是公元 1932 年春的大事件。由于他为这次起义作了如此周密的准备,以致于他的同伴们能够既不慌张也不迟延地执行他的计划。(见原作第 1 页。)

阿维丝·艾吾哈德所谈的希望立即被这一则消息所破灭,即厄内斯特被(从 1908 年看,将被)寡头政治于 1932 年所打败。互相冲突的视角并行增加了阿维丝·艾吾哈德叙述的戏剧性,而作者在前言与第一页隐含的讥讽视角,在使读者得到美学欣赏的同时,展开了小说的政治哲学。这种文字反语的快感,当然在于小说给予了读者以优越感;读者会沾沾自喜地认为,他能够看透他时代特有的双重思想。我们不妨称这为"谦恭的幽默",但是把这一短语用于《铁蹄》包含着某种讥讽之义。

伦敦并没有给予他虚构的历史学家以全知全能的本领只在这个程度上二元视角的作用才与"谦恭"挂上了钩。此小说的许多读者都厌烦安东尼·梅瑞狄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阿维丝·艾吾哈德,尽管伦敦确实在几个方面限制了他小说中的历史学家。由于伦敦不交代阿维丝和厄内斯特·艾吾哈德遇难的确切情况,他就能将他的政治思想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正是高明的政治行动所必需的。假如我们绝对相信历史决定论——假如我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那就很少有或根本就没有行动的动力了。

用谦恭的意图就是要解决一个具体的张力;这一张力存在于"理想"与理性之间;即鼓舞人的行动的'理想"与意识到这种激励人心的理想如不加以限制可能是危险的。这种限制,权且称为反理想,通常以高度尊重容忍的形式出现。政治行动与理想意识不可分,然而,行动者如完全被其理想支配就是盲动的。威廉·詹姆斯在

《实用主义和宗教》一文中竭力将容忍与宗教结合起来，然而他的思想也完全适用于政治，他说："在宗教上很大的分歧在于一些人坚信，世界一定会被而且将被拯救，而另一些人宁愿认为，世界也许会被拯救"。小说开始时批评政治权力过于集中，这恰好是它限制自己权力之时。根据这一标准，《铁蹄》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谦恭是一种小说家谱的一个特征，这些小说教我们识别极权主义。奥威尔以把"新话附录"附于《一九八四》这本书的方式，表明1984年极权主义社会到2050年时将经历一些变化。这种封闭形式不利于对极权主义政府将取得绝对静止的控制这种前景提出警告。在小说后部的一场表明了相同的道德标准；在这一场景中，奥布朗（温斯顿，史密斯未来的朋友，后来变成了虐待者）重放他与温斯顿之间的一段秘密录音谈话。温斯顿发誓要向一个孩子脸上泼硫酸水，要撒谎，传播性病，竭尽全力去反抗大哥。奥布朗重放磁带，以此贬损温斯顿在自己头脑中的形象，以打败他。但是读者很可能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一场景的意义，并且注意到，不管下面一句话看起来多么正确，即人必须"变成龙才能跟龙打斗"，那些为了反抗极权主义而变成极权主义的人们却失去了他们赖以进行政治反抗的道德基础。

在一系列这类小说中最近的一部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侍女的故事》。此小说，在讽刺那些研读奥弗雷德被发现"手稿"的21世纪学究们同时，提出了一个与《一九八四》结尾类似的反结尾。阿特伍德在小说结尾，根本没有向读者交待主人翁奥弗雷德的命运，她成功地将反乌托邦理想与反理想相结合。这些学究们关心指挥官是谁甚于关心奥弗雷德的斗争；这就提醒阿特伍德的读者们，他们无法登上政治正确这一层超验的楼。这一幽默使人意识到每一个人的观点都可能有片面性。

随着《铁蹄》的进展，脚注继续贬损阿维丝·艾吾哈德的叙述，但阿维丝·艾吾哈德与安东尼·梅瑞狄斯之间的张力没有变化。这种静止性是本书在艺术上最大的失误。一些时候，安东尼·梅瑞狄斯完全成为本吉·伦敦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另一些时候，梅瑞狄斯，伦敦本人，和厄内斯特·艾吾哈德打成一片，人们几乎认不出真理来自哪一方。在"结束的开始"一章，阿维丝·艾吾哈德报告了她丈夫的预言之一，对此有脚如下脚注：

> 艾吾哈德的社会预见性是卓越的。正象回顾过去事件那样历历在目，他预见到了受宠工会之缺陷，工人等级制度之兴起与缓慢的衰落，和衰落的政治寡头与工人等级为控制庞大的政府机器而斗争1。（见原作第226页）

下一个脚注仅仅重复这种情感："我们情不自禁要对艾吾哈德的远见感到钦佩！"

在以后的脚注中，伦敦试图压低历史组织的调门，例如脚注在评述象"虚假"和"声张虚势"这类字时，提示说在将来完全成时里，这些词语会从日常词汇中消失。如果我们不愿把伦敦想象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盲目乐观者，这样运用二元视角只能意味着作者想唤起读者的讥诮心情。素谱反语和讥讽的伦敦在梅瑞狄斯的注释中偶尔引用了阿姆布劳斯·比尔斯的《魔鬼词典》。

小说在半途中结束，这样的结构用意在于把政治行动所需的确定因素与政治谦恭建立其上的不确定因素结合起来；阿维丝·艾吾哈德的叙述以一未完成的句子结束："任务的伟大可能被理解，当它被……"跟在这残句之后一脚注告诉我们，艾吾哈德手稿到此结束，而且显得阿维丝·艾吾哈德在被捕前有时间把手稿藏匿起来。伦敦以不交代叙述结论和艾吾哈德夫妇命运之方式来增加他认为可能是不充分的叙述的戏剧性。他也同时以此增加了幽默感，因为这样不交代确定性是对大众传媒那些史诗式结局俗套的讽刺，而这些俗套通常起到控制危险的平民党情绪的安全阀作用。

不管我们是否会因为没读《铁蹄》而非常遗憾，但是爱好文学的人们千万不要认为，此小说缺乏艺术性和乐趣。伦敦融合了社会主义的和散文式的美国幽默，并且运用二元视角以探索

政治矛盾和奥秘。第一种幽默向我们表明原初读者的许多情况，而二元视角对当今政治时代的读者更具吸引力。《铁蹄》作为当代政治小说的先驱，同时作为一部长达几十年来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非常值得一读再读。

注释:

[1] 关于杰克·伦敦的生活和工作中的矛盾现象许多人讨论过。例如，昌迪拉·默汗所著《社会主义对个人主义：杰克·伦敦》。见哈瑞什·特里维迪编：《美国政治小说》，新德里联合出版社私人有限公司 1984 年版，52–67 页。

④本文中《铁蹄》的译文为本文译者所译。——译注

㈣它也开始了 20 世纪预示世界末日恐怖景象虚构之传统。参见约瑟夫·布劳特纳：《现代美国政治小说》，得克萨斯新闻大学 1966 年版。

¼ 在两个地方的任何一处，伦敦都没有表示此诗为丁尼生所作，尽管他在其书评的修改稿中有此表示。见亨廷顿图书馆 1933 号。

½ 布瑞安·麦克赫尔在《后现代主义小说》(纽约 1987 年版)里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最好可以被看作是从经验论向本位论的关注转变。林达·贺钦把后现代主义称为"批评的同谋"。见《后现代主义的政治》，伦敦 1989 年版，2 页。

¾ "[长篇小说]变得更加自由和灵活，它们的语言花样翻新，因为兼容了文学以外的各种词汇和长篇小说层次的文学语言，它们变为对话体，充满笑声，反语，幽默，自我嘲弄的因素，以及最后——这是最重要之点——小说在这些其他体裁中插入：含糊因素，某种语义上的无结论性，与未完成的，仍在进化的当代现实(即无止境的现在)活生生的接触"。见巴赫金：《对话体的想像》，米歇尔·郝奎斯特编，得萨斯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7 页。

(特邀编辑：刘树森)